评乾隆朝金川之役

李鸿彬　　白　杰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government forces suppressed a local rebellion in Jinchuan. The "Battle of Jinchuan" as it has become known, was consistent with state strategy which aimed at maintaining the unity of the nation, protecting its territory and frustrating foreign invasion. The fighting was prolonged due to errors in decision - making, leadership, strategy and tactics. Enormous amount of money was wasted, but the rebellion was suppressed. After the fighting ended, a profound change occurred in the area. Jinchuan broke through the confinement and isolation of the past and the entire society advanced.

所谓金川之役,包括乾隆十二至十四年和三十六至四十一年清政府发动的两次对金川地区的战争。金川位于四川西部,"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①,可是第一次金川战争,清廷"调派京东及各省满汉土官兵,共六万二千五百余员名","用帑银七百六十万四千八百余两"。第二次金川战争,"共调集十四省营十八路土司满汉屯土官兵,一十二万九千五百余员名","动帑银六千一百六十万两。"②此役是乾隆帝"十全武功"中历时最久、耗资尤巨的战争,原因何在? 如何评价? 确实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就此谈些浅见。

一、战争性质

金川因促浸(藏语大川)、赞纳(藏语小川)两河流经其境,"临河山有金矿得名。"③金川历史悠久,据史籍记载,"禹贡梁州之域,本氐羌部落,汉为西南诸蛮,"④隋始设金川县,唐置金川州,属维州管辖,北宋归威州,明封金川喇嘛哈伊拉木为金川寺演化禅师,世袭土司,领有其地,隶杂谷安抚司。数传后,以河名分为大小金川。顺治七年(1650),小金川卜儿吉细"归诚授职。"⑤康熙五年(1666),其子"土司嘉勒巴内附,给演化禅师印,俾领其众。"⑥乾隆十年(1745),由其曾孙泽旺袭土司职。此外,康熙六十一年(1722),大金川土舍色勒奔初"投诚,遵奉调遣,拨发土兵五百名,"⑦从四川提督岳钟琪平定"松潘、阶、文之接壤之羊峝"叛乱有功,⑧被"委以副长官司职衔,令管理驻牧事务。"⑨雍正元年(1723)三月,清廷"给以安抚司职衔。"⑩乾隆七年(1742),色勒奔初病故,"以其子莎罗奔承袭。"⑪

这种土司制度是我国自秦汉统一以来,为了加强对西南"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⑫的少数民族进行统治,逐渐形成"因俗而治"、"其道 在于羁縻"⑬的治理办法。"四川边境寥廓,历代多设土司以相控制……清初,戡定川境,各土司次第效顺。"⑭此制的特点:一方面中央王朝对归

诚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委以职衔,授给名号,世官其土,世有其民;另一方面土司土官必须遵守和服从中央王朝的政令,并尽贡、赋、兵等义务。清入关定鼎北京后,在西南虽然沿袭明朝的土司制度,但是到了雍正年间,看到此制的严重弊端,乃大力推行改土归流。不过为了分化瓦解,减少阻力,依然保留一部分土司,大小金川则为其例。

在金川周围,还分布众多的其他土司,共同构成所谓"嘉绒各部"。金川东部有杂谷、瓦寺,东南部有沃日,西部有革布什咱,西南部有巴底、巴旺、布拉克底、章谷,南部有木坪、明正,北部有绰斯甲布、从噶克、卓克彩、梭磨、党坝等土司。

自从大金川色勒奔初任安抚司,及其子莎罗奔袭职后,势力大增,于是有恃无恐侵犯邻近土司,并企图兼并其侄泽旺领有的小金川。乾隆二年(1737),色勒奔初领兵攻占革布什咱土司丹津罗尔布的盖古交地方。[15]四年(1739)七月,他又三次出兵攻打革布什咱。[16]九年(1744),大金川与革布什咱各自为了争夺巴底,"互相争杀。"[17]此外,莎罗奔袭职后,谋图吞并小金川,"寻以女阿扣妻泽旺,泽旺懦,为妻所制,"[18]并且阴结泽旺之弟良尔吉为内应。十一年(1746),莎罗奔"劫泽旺归,夺其印。"[19]川陕总督庆复,见事态严重,进行"查究",莎罗奔无奈,"始将泽旺放回,归还印信。"[20]十二年(1747)正月,莎罗奔发兵攻打革布什咱的正地寨,随之又劫杀明正土司所属的鲁密、章谷,公然纵兵进攻坐汛此地的清军把总李进廷部,清军"不能抵敌,退保吕里。"[21]大金川兵乘胜竟直渡河口,逼近入藏要冲打箭炉附近的毛牛地方。另一路大金川兵进入杂谷,在"党坝下营,迫胁蛮民投顺。"[22]与此同时,莎罗奔又勾结绰斯甲布、结隆冲二土司,"攻围霍耳章谷",进袭清军,"千总向朝选阵亡,并侵压毛牛,枪伤游击罗于朝","千总杨璠京亦带矛伤。"[23]正如乾隆帝所言:"逆酋敢于侵扰,伤及官兵,猖獗若此。"[24]这就是第一次金川之战的起因。

经过第一次交战之后,金川土司的旧势力,没有受到沉重打击,于是很快恢复元气,依然如故,"自恃地广人众力强,与各土司构兵,迄无宁岁,故各土司皆畏之如虎,而以势分力散,又莫能如之何。"[25]乾隆二十年(1755),大金川莎罗奔联合绰斯甲布,发兵攻打孔撒土司嘉齐山,将百姓碉房烧毁,又围攻革布什咱丹东官寨及格罗斯喇嘛寺。[26]二十三年(1758),莎罗奔因身体负病,一切事务由其侄郎卡管理,郎卡为了控制革布什咱,以一女妻革布什咱土司,遭到拒绝,于是出兵攻打革布什咱,将土司四郎多博登和前来救援的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围困在吉地官寨,同时又侵犯小金川孙克宗地方。[27]二十五年(1760)五月,莎罗奔病死,郎卡袭土司职,垂涎党坝。二十七年(1762)九月,大金川兵进攻党坝,沿途抢掠,占据玛浪,围攻官寨。[28]三十年(1765)十二月,郎卡又发兵攻打党坝,占领额碉,并炮击格藏官寨[29]。同时又与布拉克底,聚众围攻巴旺卡卡角,烧毁寨房,杀掠人口,占领其地。[30]这时小金川土司泽旺因年老体弱,由其子僧格桑主政,势力日增。三十二年(1767),郎卡了为拉拢小金川,将其女许配僧格桑为婚,"遂与小金川互相结连,不服抚谕。"[31]三十五年(1770)四月,大金川郎卡病故,其子索诺木袭职。九月,小金川发兵"攻掠沃克什(即鄂克什)土司色达克拉寨落牲畜,"[32]大金川则支持。三十六年(1771)四月,索诺木进攻革布什咱,杀害土司色楞敦布多,并向清廷提出"将革布什咱地方百姓赏给当差。"[33]而僧格桑乘机攻打鄂克什、瓦寺、明正土司,并包围坐汛达围寨内的清军把总洪廷瑞所率绿营兵二十名、土练二百名、土千总阿吉等。[34]而且小金川"各处添碉卡",[35]以防官兵来攻。因此,乾隆帝说:"僧格桑乘索诺木侵害革布什咱土司之衅,盖复滋横,并且修筑碉卡,谋抗天朝,势不得不加以兵革。"[36]这就是第二次金川之战的起因。

由上可见,虽然两次金川之战的起因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激起的实质性问题却是一致

的，概括而言，有以下两点：一是恃强凌弱，不断侵犯邻近土司，占领土地，杀伤民众，掠夺财物等；二是抗命朝廷，不遵政令，对前来调解土司纠纷的地方官，“往谕罢兵退地，逆酋阳奉阴违”，或者“不从，辄敢干抗，”[37]甚至围攻清军汛地，射杀官兵。因此，金川之役既不同于民族压迫和歧视激起的少数民族起义，亦不同于阶级压迫、官逼民反而掀起的农民战争，而是反清的地方叛乱，它和平准、平回的性质是相同的。

现在再来考察清朝为什么发动金川之战，主观与客观、直接与间接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就清朝最高统治者和决策者乾隆帝的主观而言，他无疑是要维护清朝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希望能够长治久安。乾隆帝虽然不是清王朝创业之君，却是一位有作为的守成之主，他对顺、康、雍三帝开疆拓土而奠定的疆域十分珍惜，特别强调不能使先帝“式廓之版图或有侵削。”[38]并指出“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39]而金川地区，“东则四川成都，西则西藏，南则云南、贵州，北则西宁、青海，与各处疆界相连。”[40]这些地方都是政治敏感地区，所以乾隆帝在谈及金川问题时说：“吾则以为既受职为土司，则是我臣，而其地近接成都，远连卫藏，则是我土，我土我臣，而横生逆志，蚕食邻封，将欲大有所为，弗剿而灭之，则四川将不能安枕……故余不咎人之议为穷兵黩武，而转咎己之类于姑息养奸……若谓余穷兵黩武，则余赖天恩平伊犁、定回部，拓疆二万余里，岂其尚不知足，而欲灭蕞尔金川，以为扬赫濯、纪勋烈之图哉！”[41]这段话充分表明了乾隆帝发动金川之役的意向和目的，是为了国家安定、消除动乱隐患。

其次就清朝面临的国际形势而言。从 16 世纪到 17 世纪前期，西方殖民势力由海陆两方面向东方进侵，他们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进行侵扰掠夺，葡萄牙占领澳门，荷兰占领澎湖、台湾，英国占领虎门，进入广州。而沙俄由北方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攻城占地，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清王朝建立后，对于这些外来的陌生者深感威胁，采取防范态度。早在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帝对荷兰要求在“福建地方，不时互市”，便向身边廷臣说：“外国人不可深信。”[42]他到了晚年，曾告诫后人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43]雍正、乾隆皆继承康熙夙志，对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如禁止传教、限制贸易等。

从以上安内和攘外两者关系来看，清王朝把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社会安定、抵御外敌作为国家战略。“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44]，金川之役亦不例外，它必须服从清朝的国家战略，这就是此役发生的真正原因。

二、战中失误

金川战争的性质只为取得胜利提供了可能性，要使可能性变为现实，乾隆帝还必须依据客观实际的形势和特点，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和具体战斗方法的战术。如何制定能够取胜的战略战术呢？孙子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45]就是要求熟悉敌情我情，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制定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作战方针，可见信息对决策的重要性。那么金川地区有哪些实际情况对战争有影响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自然条件。金川地区全境皆山，平均海拔 3000 米以上，属于高寒地带。这里山高谷深，河流湍急，把地面切割分隔，“羊肠一线折于悬崖峭壁中，虽将军大臣亦多徒步。”[46]而且“重关叠隘，山路险巇，马蹶不能驰，人喘不能骋。”[47]据清军将领鄂实奏称：“人易发喘，须服人

参。"[48]更严重的是因空气稀薄，外来人、马经常昏倒，必须对鼻喷烟方能苏醒站立。[49]金川高原，"重山叠嶂，雾重风高，山岚瘴气，多寒少暑，春夏雨雪，经旬累月，罕有晴时，每雨则霹雳大作，电光中皆有声。至八九月间，始得晴霁，隆冬积雪丈余，山谷弥漫，坚冰凝结，道路不通。"[50]气温变化很大，"一日之间，寒暖顿殊，咫尺之地，阴晴各异，严冬天晴时，日中可穿春服，盛夏天阴时，朝晚亦可披裘，四时无大寒大热，然倏忽变幻如此，不必烟瘴为厉，稍不自谨，中之立病。"[51]这种险峻而恶劣的自然条件，对部队的行军作战和后勤的运输供应，都造成很大的困难。

——社会民情。金川是藏族的聚居地，大金川土司管领百姓 4 千多户，有兵丁 3 千人；小金川土司管领百姓 6 千多户，有兵丁 4 千人。[52]大、小金川土司在各自的辖区内享有绝对的权威，占有境内的土地、山林和人民，掌握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这里藏民信仰苯教，"惟喇嘛之言是听。"[53]金川土司崇奉苯教，并将政教势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土司往往留一子承袭土司职衔，其他诸子都出家为喇嘛，他们仍保有土舍身份，同时又成为当地宗教势力的领袖，地位仅次于土司，并参与土司的政务。金川土司通过宗教势力进一步控制百姓，金川民众"俗尚武，咸工击刺之术，虽妇女亦解谈兵，闻者征调，殊踊跃向往，临阵奋不顾身"。而且"人多膂力，类能手挽强弓"，"箭镞利甚"，还"善用火枪"。[54]因此，金川人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战斗力。

——碉楼群竖。土司署所为官寨，四周建造许多碉楼，为作战兵堡，民居称寨子，各户必有碉房，为守望之所，于是把平时的住房和战时的堡垒合为一体，各自独立，又互为犄角之势。另外，在境内的关隘、渡口、沿途的制高点皆筑有层层战碉，构成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这些兵垒，就地取材，用石砌成，十分坚固。每座兵垒"如小城，下大巅细，有高至三四十丈者，中有数十层，每层四面各有方孔，可施枪炮。"[55]为了加强防御能力，"或于碉外增壕，或于碉内积水，或附碉加筑护墙，地势本居至险，防御又极周密。"[56]而且"有埋瓮听远之法，掘地丈许，可听十数里，自此深一尺则远十余里，以次递增可及百里，静夜伏地，潜听百里中人马行声，虽衔枚卷甲，皆历历可闻，"[57]从而可以了解敌军行动，提早防备。这种石碉有很高的防御性能，"故一碉不过数十人，万夫皆阻，"[58]可见阻滞进攻的作用。

综观上述，金川易守难攻，清军在特殊的地区，与特殊的敌人，打一场特殊的战争。

乾隆帝作为金川之役的最高统帅，"用兵所关甚巨，宜周详筹画，期于必克。"[59]可是，他一则盲目轻敌，认为金川"蕞尔穷番，何足当我王师？"[60]二则敌情不明，所谓"朕初未知地既险远，碉复坚峭。"[61]可见乾隆帝对金川之役没有足够认识和思想准备，因此未能根据战争的形势与特点，制定出既科学又周全的战略方针，致使前线将领无所遵从，于是犯了严重的战略战术错误。

金川地区天时、地利、人和，及作战手段的优势，主要集中表现在兵垒碉卡上，如何解决好碉卡问题，是金川之役取胜的关键。第一次金川之役期间，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云贵总督张广泗奉调为川陕总督，"专倚征剿"，采取逐碉而战、逢碉必攻的战略，分兵 7 路、10 路进攻，"其扼隘处，必有战碉，甃以石而窍于墙垣间，以枪石外击，旁则无路进兵，须从枪石中过，"[62]可见伤亡很大。清军"营中向有子母劈山等炮，仅可御敌，不足攻碉"。当时四川巡抚纪山在军前"制有九节劈山大炮二十余位，每位重三百余斤，马骡不能驮载，雇觅长夫抬运，以之攻碉，若击中碉墙腰腹，仍屹立不动，惟击中碉顶，则可去石数块，或竟有击穿者，贼虽颇怀震惧，然即甃补如故。"[63]结果"诸将反多失事，张兴为降番所诱被戕，噶固土兵与贼交，游击孟臣死焉。"[64]各路受阻，"无一路得进。"[65]此时，张广泗颇有感叹的说："贼碉险峻，枪炮难施，攻一碉不啻攻一城。"[66]于是由攻转为守，"何敢复轻言进兵，"[67]便"疏请原调汉、土官兵三万外，增兵一万，"[68]

“乃克有济。”[69]

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乾隆帝见张广泗督兵未能奏效,命大学士讷亲为经略,讷亲到川后,求胜心切,认为张广泗分兵进击是错误的,“遂谕军中期以三日取噶喇依,违者以军法从事。”[70]诸将无奈,被迫率军进攻,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伤亡士兵数千人。讷亲不敢言战,转而与张广泗合谋,传令筑碉,采取“以碉逼碉”的战术。七月,讷亲奏言:“臣与督臣(张广泗)又思贼番因险据碉,故能以少御众,今我兵既逼贼碉,自当亦令筑碉,与之共险,兼示以筑室反耕,不灭不休之意。贼番自必摇动,且守碉无须多人,更可余出汉、土官兵,分布攻击,似亦因险用险之策。已饬各官星速修砌,递照逼攻。”[71]随之讷亲、张广泗又合疏要求增兵,疏曰:“天时地利皆贼得其长,我兵无机可乘,冬春间当减兵驻守,明岁加调精锐三万,于四月进剿,足以成功,至迟亦不逾秋令”。讷亲又说:“来岁增兵,计需费数百万,若俟二三年后有机可乘,亦未可定。”[72]

乾隆帝对张广泗、讷亲统兵征金川失去信心,传旨召其回京问罪,命协办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傅恒赴川到军前后,调查清军情况,针对张广泗、讷亲的夺碉战术,提出严厉批评,他奏言:“臣查攻碉最为下策,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濠,兵不能越,而贼得伏其中,自上击下。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客主劳佚,形势迥殊,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顶即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每得一碉,即拨兵防守,致兵力日分,即使毁除,而贼又于其地立卡藏身,以伤我卒,是守碉毁碉均为无益……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73]

第二次金川之役时,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定边将军温福,奉命率军二万余人进攻大金川,因进军受阻,驻营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达,以防守小金川之地。可是“温福刚愎,不广咨方略,惟袭讷亲、张广泗以碉卡逼碉卡之故事,修筑千计,所将兵二万余大半散于各卡,每逾数日当奏事,即派兵扑碉,不计地势之难易,得不偿失,士心解体。”[74]大金川兵乘机偷袭木果木,温福兵败被杀,另有副都统巴朗、阿尔素纳,御前头等侍卫德尔森保,前锋参领观音保,提督马全、牛天畀,总兵张大经,副将多隆武等,上至都统、提督,下至千把总、外委大小文武官员 366 人阵亡,牺牲士兵 4044 名,[75]致使小金川得而复失。

金川之役,除了清军前线将领犯了以卡逼卡、以碉逼碉的夺碉战术的错误,造成重大损失外,乾隆帝在决策、指挥上也有严重失误。

第一,半途罢兵。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第一次金川之役进行已两年,胜负未定,乾隆帝突然传谕罢兵,企图草率结束这场战争。所谓“上以金川非大敌,劳师两载,诛大臣,失良将,内不怿。及是闻其地险难下,益不欲竟其事,”[76]并以皇太后懿旨三次下谕罢兵,认为“圣母此旨,确切理势,并非偏于姑息,朕本心亦实以为当然。”[77]于是不断传旨“机政殷繁,部务綦重,倚毗方切,是以召令还朝”[78],命傅恒迅速返京。

战争不是儿戏,而是为了达到严肃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因此,打一场战争必须达到目的,否则干脆就不打,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金川之役的目的,就是要平定地方叛乱,维护国家统一,乾隆帝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却半途罢兵,造成官兵战斗力减弱,这就把成功的机会让给敌人,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古人云:“一日纵敌,数世为患,岂可舍将灭之寇,更烦再举。”[79]所以傅恒不同意罢兵,疏曰:“金川事一误,今复轻率蒇事,贼焰愈张。众土

司皆罹其毒,边宇将无宁日。审度形势,贼碉非尽当道,其巢皆老弱,我兵且战且前,自昔岭中峰直抵噶拉依,破竹建瓴,功在垂成,弃之可惜。且臣受诏出师,若不扫穴擒渠,何颜返命?"[80]可是乾隆帝不听,决计罢兵,并且说:"蕞尔土司,即扫穴犁庭不足示武;且果献俘,则必悬首藁街,非所以受降之信。"[81]

第二,拒敌归降。自古以来治军者,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取得战争的胜利,多用剿抚二策,除了武力以外,通过政治手段瓦解敌人,使敌人归降,从而达到战争的目的。金川之役中,乾隆十二年(1747)九、十月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派人赴清营表示愿率部众投降,却遭到乾隆帝和前线将领的拒绝,据四川巡抚纪山奏称:"莎罗奔差头人赴军营及抚、提衙门投禀乞降,但未亲赴军营,真伪难测,不便准其投诚"。川陕总督张广泗亦奏称:"该酋与伊兄就日吉父子,屡遣番目乞降,断难允行"。乾隆帝认为"逆蛮反复狡猃,即使面缚归诚,尚难保其日后不复肆横,况此番官兵云集,正当犁庭扫穴,痛绝根株,一劳永逸,断无以纳款受降,草率了局之理。著传谕张广泗,务将莎罗奔擒获,明正典刑"。[82]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军在木果木大败后,乾隆帝对金川之敌切齿痛恨,于是传谕日后拒敌投降,他说:"木果木军营失事,关系大体,而诸将士之殁于王事者,多至数千,岂可不为报仇泄忿,如何尚能提及降抚了局之说? ……至将来进剿金川,受降一说,断无是理,将军等不但不可存之于心,并不当宣之于口。"[83]因此,三十九年八月,大金川土司索诺木,遣人将僧格桑尸匣刨出,差头人绰窝斯甲携尸匣,并带领僧格桑妾侧累及大头人蒙固阿什咱阿拉至清营乞降。四十年正月,索诺木派头人斯丹增往清营,送回汉土官兵 26 人以表乞降诚意。七月,索诺木兄弟五人具禀乞降,愿交出勒乌围官寨。索诺木三次乞降,均被拒绝。[84]

古人云:"夫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军之善政也。"[85]可是乾隆帝没有从战争全局考虑,而自恃强大,意气用事,金川敌人乞降,本来是结束战争、取得胜利的好机会,却弃之不要,欲以武力消灭敌人。这种一味以武取胜的指挥战术,使金川人失去了求生之路,转而以死相抗,于是战斗空前激烈残酷,清军伤亡更加惨重。

金川之役,由于乾隆帝和前线将领对金川地区的特殊性认识不足,而在决策、指挥、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致使此役历时既久,耗资又巨。为了说明问题,仅就拒敌投降所造成的损失进行简要测算。第一次金川之役从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十一日到十四年(1749)一月二十七日,经历 695 日,用银 7648000 余两,平均每日耗银 11004 余两。因十二年九月三十日清廷拒敌乞降,使战争延长 498 天,耗银 5479992 余两。第二次金川之役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二十四日到四十一年(1776)二月四日,经历 1694 日,用银 61600000 余两,平均每日耗银 36363 余两,因三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清廷拒敌乞降,使战争延长 550 天,耗银 19999650 余两,前后两次共计延长时间 1048 天,耗银 25479642 余两。当然评价金川之役的得失,不是依据耗银的多少,而是要看战争的目的是否达到,即平定叛乱、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社会安定,正如马克思所言:"谁要想战胜敌人,他就不会去同敌人讨论战争的代价。"[86]

三、战后变化

金川之役的胜利,达到了战争的目的,完全符合国家战略的需要。战后,清政府在金川地区推行一系列变革措施,使其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

政治方面:

1、政区建置。清政府为了将原来对金川土司辖区的间接统治改变为与内地州县相同的行政区划进行直接管理，乾隆四十一年(1776)于大金川地设阿尔吉州，小金川地设美诺厅，下属有美诺屯、大板昭屯、底木达屯、章谷屯。四十四年(1779)十月，裁阿尔古州，并入美诺厅，以其原领之阿尔古屯改名为绥靖屯，噶拉依屯改名为崇化屯一并归属。改美诺厅属的底木达屯为抚边屯，裁大板昭屯，并入抚边屯。四十八年(1783)，改美诺厅名为懋功屯务厅，原美诺屯易名为懋功屯。该厅领有懋功屯、抚边屯、章谷屯、崇化屯、绥靖屯。五十年(1785)，从打箭炉厅分出鄂克什安抚司归懋功厅。五十一年(1786)，将原来阜和协的绰斯甲布安抚司改属懋功厅。至此懋功厅"领屯务五、土司二。"[87]可见，大小金川原有的区划格局已被打破了。

2、新设营汛。清政府为了金川社会安定，以防叛乱再起，决定派兵驻防，"资其控驭弹压。"[88]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清廷命明亮为成都将军，移驻雅州节制，而提督桂林令其移驻美诺。[89]后来考虑"原议将军驻扎雅州，但将军、总督两地相悬，遇紧要番情，不获立时商榷，并勘明雅州城地势逼仄，满兵难于挈眷，宜令将军仍驻成都"，而命提督桂林移驻雅州。[90]乾隆帝对成都将军的职权十分重视，指出"于其地安营设汛，移提镇大员统兵驻守，并添设将军驻边弹压，固足以震慑诸番，但所设之将军，若不委以事权，于地方文武不令其统属考核……尚属有名无实……自应令成都将军兼辖文武，除内地州县、营汛不涉番情者，将军无庸干预外，其管理番地之文武各员并听将军统辖。"[91]这就明确规定明亮为金川地区(即懋功屯务厅)最高行政长官，而且"每年至两金川新设营分巡两次，"[92]查看地方。清军营汛具体分布如下：大金川共驻兵 3000，于勒乌围设总兵 1、游击 1、都司 2、守备 2，驻兵 1000。噶喇依设副将 1、都司 2，驻兵 700。噶尔丹寺设游击 1、守备 1，驻兵 300。茹寨设参将 1、守备 1，驻兵 400。马尔邦设游击 1、守备 1，驻兵 300。曾达设守备 1，驻兵 300。小金川共驻兵 3000。于美诺设总兵 1、游击 1、都司 2、守备 3，驻兵 1000。底木达设都司 1，驻兵 500。大板昭设守备 1，驻兵 300。僧格宗设参将 1，驻兵 500。翁吉尔垄设守备 1，驻兵 300。约咱设都司 1，驻兵 300。[93]四十五年(1780)，于绥靖营设游击驻防，崇化营设游击驻防，庆宁营设守备驻防，抚边营设守备驻防。另外塘汛有资理寨、泽尔脚寨、崇德汛、独松汛、八角碉六屯、额尔撒尔。[94]由于金川社会日益安定，清政府不断减少驻军，开始改变某些军政建制，到了五十四年(1789)，这里"一切章程政教，先后厘定，与州县相同。"[95]

3、人口变动。清廷为了铲除金川地区盘根错节的土司势力，将金川人口大批外迁，而把外地人口不断内移，逐渐改变单一的民族成份。首先是严惩大小金川叛乱的罪犯，据刑部奏："逆酋索诺木及其兄弟，大小头人等，暨各犯家属二百五十余人械送至京。"[96]经审判，"首犯"索诺木、"助恶"莎罗奔冈达克、索诺木彭楚克、阿青等"罪大恶极"的 12 人，均凌迟处死。索诺木之母阿仓、头人尼玛噶喇克巴、阿布颇鲁等 19 人，均处斩。并将已死的小金川主犯僧格桑之首悬于市。[97]此外，罪犯及家属等永远监禁者 16 人。其余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者 52 名，索伦兵丁为奴者 45 名，三姓为奴者 34 名，赏给功臣之家为奴者 58 名。所谓"通计渠魁首恶以及逆党余孽，或置之重典，或贷其余生，悉准情罪之重轻，以彰威德。"[98]其次是将金川百姓男妇 189 人，解到北京编为 1 佐领，入内务府正白旗，设佐领 1 员，骁骑校 1 员，领催 4 名，马军 70 名，"于香山附近，令其建碉居住，"[99]学习攻碉之术。第三是把战争中金川投降的 20000 多人，分别赏赐、安插在绰斯甲布、革布什咱、梭磨、卓克基、从噶克、党坝、明正、木坪、布拉克底、巴旺、鄂克什、瓦寺 12 土司，及杂谷屯练等地方为民。[100]第四是清政府通过军屯、民屯、招商等方式，从金川邻近的土司，以及内地州县，迁入大批人口，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战后金川地区

"安插及分户加垦番屯兵民共七千二百八十二户。"[101]金川由原先"番民"独居,则改变为"汉番杂处。"[102]

经济方面:

清政府为了医治金川地区的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大力推行屯田,屯垦之初,据《四川通志》记载,"案新疆五屯,安插屯田户口"有以下几种:[103]

1、屯练,"系杂谷五寨屯练随征至金川,原派差防拨留给地耕种。"[104]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开始移驻金川屯垦到四十三年(1778),共移驻"一百五十户,计男妇大小三百六十五名",分别安插在小金川大板昭 50 户、丹札寨 50 户,大金川卡卡角 20 户、卡尔金 10 户、沈角沟 20 户,每户给地 30 亩,还有口粮、籽种、牛具。[105]

2、屯"番","系平定两金川后向化番人,分拨给地耕种。"[106]这些归降的金川民众,"悉视屯兵例,概以牛具籽粮。"[107]每户给地 30 亩,免五年纳粮,乾隆三十八年(1773),有 292 户降民"受地安排"。四十二年(1777),安插降民 1413 户,授地屯垦。[108]

3、屯兵,"系额设五营,选募兵丁三千名,除分拨差防外,余俱给地耕种。携眷赴屯者为眷兵,单身赴屯者为单兵,由屯番选补者为屯兵。"[109]可见屯兵包括三种人:一是眷兵,"为使兵丁安心尽力,增加常屯人丁,允许兵丁携眷居屯,并允许建昌、松潘、维州之兵丁携眷来居,来时官为资送。每名携眷兵丁,授地三十亩,以二十亩所获粮交官,十亩所获为己有。"[110]二是单兵,即驻兵屯种者,规定驻军"三人给地亩一分,令两人当差,一人耕种。"[111]每兵给地 20 亩,每二名合种地 30 亩,[112]官办牛具籽种以资耕作,岁需盐菜银两由国库支付。[113]三是屯兵,这种由屯番中选补者,仅作为驻兵,并非直接屯垦人。

4、屯民,"系内地人民愿赴屯开垦者,给地耕种。"[114]凡应募来者,每 1 户给地 30 亩,并为子孙恒产。从外地来时,由本籍咨送,大口每名给盘费银 1 钱,小口银 3 分,口粮各 1 升,由沿途牧令支发。到此准给屋庐,无屋折银 2 两。还资以农具、耕牛,两户合 10 两,每户给籽种 2 石。免 5 年纳粮,自 6 年起,每户仅纳 1 斗 2 升。[115]

清政府对金川屯田十分重视,为了不误农时,乾隆四十一年(1776)秋,"番地籽种先经采买四十余石,不敷散给。饬茂州、保县于存仓内拨五百石,解运噶喇依、底木达等处。于内地采办麦一千石,解赴美诺、勒乌围等处。至牛只先经采买五百余头,随饬于松潘所属番地采买一千六百头,内地附近各属采买四百头,陆续解往。"[116]并给每户农具 1 副共 5 种,有铧头、木方锄、小锄、尖齿镰、锯齿镰,一方面雇铁匠赴屯打造,一方面由内地制解金川,仅锯齿镰就运去 18000 把。[117]另外,还引进试种新的农作物品种如葫豆、[118]水稻、[119]蔬菜等。[120]金川地区实行屯田后,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各屯播种稞麦豆荞,俱滋长茂盛。"[121]而且人口日增,乾嘉之交时统计:屯练 170 户、屯"番"1997 户、单兵、眷兵、屯民共 5115 户,总共屯"番"兵民 7282 户、纳粮 1295 石。[122]

战后金川地区改变了过去闭塞状况,内外交通逐渐畅通,以往只有两路入金川,后已有五路可通,一由灌县至懋功为东路,一由打箭炉至章谷为南路,一由杂谷至抚边为西路,一由绰斯甲至绥靖为北路,一由木坪至鄂克什为中路。[123]并在境内造桥修船,改善交通,据统计,共修补 8 处渡船、7 处索桥、9 处木桥。[124]随之商业也日渐繁荣,商贾云集,他们从内地运入大批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换取当地药材、皮毛等土特产品。

文化方面:

金川战役后,清政府认为金川苯教喇嘛助纣为虐,于是废除苯教,振兴黄教,并将都甲喇嘛

雍中泽旺、堪布喇嘛色纳木甲木粲二人押解京师，以“助逆咒诅”，“罪大恶极”凌迟处死。[125]乾隆四十一年(1776)九月，乾隆帝传谕曰：“两金川喇嘛均系邪教，不便仍留其地，但番人习奉佛教，该处独无喇嘛，似非从俗从宜之道，应于噶喇依、美诺两处酌建庙宇，即于京城喇嘛内派往住持。”[126]从此大力倡导黄教，并传旨：是年由政府拨款，将噶喇依已“芜废”的雍中喇嘛寺，进行重建，改名广法寺，赐御书“正教恒宣”匾额。五十年(1785)，又将美诺(懋功屯)的美笃喇嘛寺，“捐俸重修”，金碧辉煌，敕名胜因寺。[127]在此期间，清廷派遣西藏黄教喇嘛桑宰敖特杂尔，并加恩赏赐班第达堪布名号，带领徒众前往金川广法寺。他到达以后，积极传经说法，广收门徒，[128]不久黄教信徒日众，终于取代了苯教。

金川民众能歌善舞，长于奏乐。战争中清军将领阿桂将俘获的一批艺童，送回京师，供奉宫廷，每逢节日庆典，表演歌舞节目，“有习锅庄及甲斯鲁者，番中傩戏也，亦命陈之宴次。”[129]据《清史稿》记载：“高宗平定金川，获其乐……金川之乐：曰阿尔萨兰，曰大郭庄，曰四角鲁。用得梨一，柏且尔一，得勒窝一。”[130]另外住在香山的金川人，每到自己的节日，以歌舞庆贺，在京师广为流传。战后，内地大批汉人进入金川地区，本地人开始学习汉语。[131]而且“新疆番众久经剃发，并半已穿戴内地民人衣帽。”[132]可见金川和内地文化得以交流。

从以上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看到战后金川的变化：由动乱到安定，由土司到屯政，由落后到进步，由闭塞到开通等。列宁说：“战争所以往往是有益的，是因为它能揭破脓包和排除俗例。”[133]金川之役正是如此，旧的死亡，新的成长，金川社会向前发展了。

---

①㉕㊶《平定两金川方略》卷首1，《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
②㉛郑栖山编纂、张羽新校注：《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总略。
③⑥⑱⑲65 73 81魏源：《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④⑤㊿53 94 101《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23，《懋功屯务厅》。
⑦⑨⑪《平定金川方略》《金川图说》。
⑧岳炯：《岳襄勤公行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
⑩《清世宗实录》卷5，雍正元年三月甲申。
⑫⑬《明史》卷310，土司。
⑭《清史稿》卷513，土司2。
⑮⑰《清高宗实录》卷219，乾隆九年六月乙亥。
⑯《清高宗实录》卷101，乾隆四年九月癸酉。
⑳《平定金川方略》卷1，乾隆十二年二月癸酉。
㉑㉒《平定金川方略》卷1，乾隆十二年三月戊戌。
㉓㉔《平定金川方略》卷1，乾隆十二年二月己酉。
㉖《平定两金川方略》卷1，乾隆二十年六月癸卯。
㉗《清高宗实录》卷557，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丙戌。
㉘《平定两金川方略》卷3，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
㉙《清高宗实录》卷754，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庚戌。
㉚《平定两金川方略》卷4，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庚申。
㉜《清高宗实录》卷857，乾隆三十五年四月丙辰。
㉝《清高宗实录》卷887，乾隆三十六年六月甲午。
㉞75 84见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163页，第152—153页，第160—162页。
㉟《清高宗实录》卷890，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乙亥。

[36][37]《平定两金川方略》卷首1,《平定小金川勒铭美诺之碑》。
[38]引自陆正明:《乾隆帝“十全武功”初探》,见《中国军事史论文集》。
[39]《清高宗实录》卷1444,乾隆五十七年十月戊辰。《御制十全记》。
[40]《清高宗实录》卷295,乾隆十二年七月乙卯。
[42]《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43]《熙朝纪政》卷6,《纪市舶》。
[44](普鲁士)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24。
[45]《孙子兵法·谋略篇》。
[46][58][62]赵翼:《平定两金川述略》。
[47][51][123][127]李心衡:《金川琐记》2。
[48]《清高宗实录》卷332,乾隆十四年正月己未。
[49]《藏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52][100][128]见李涛:《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绒地区的影响》。《中国藏学》1993年第1期。
[54]李心衡:《金川琐记》12。
[55]李心衡:《金川琐记》3。
[56]《清高宗实录》卷298,乾隆十二年九月庚子。
[57][131]李心衡:《金川琐记》15。
[59]《清圣祖实录》卷119,康熙二十四年正月癸未。
[60]《平定金川方略》卷22,乾隆十四年正月甲子。
[61]《清高宗实录》卷333,乾隆十四年正月戊辰。
[63]《平定金川方略》卷3,乾隆十二年八月辛巳。
[64][70]昭梿:《啸亭杂录》卷4,《金川之战》。
[66]《清高宗实录》卷300,乾隆十二年十月丙寅。
[67][69]《平定金川方略》卷5,乾十三年正月丁未。
[68]《清史列传》17,《张广泗传》。
[71]《平定金川方略》卷8,乾隆十三年七月辛卯。
[72]《清史稿》卷301,《讷亲传》。
[74]魏源:《圣武记》卷7,《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
[76][80]《清史稿》卷301,《傅恒传》。
[77]《平定金川方略》卷22,乾隆十四年正月癸亥。
[78]《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九日谕。
[79]《历代名将言行录》卷13,《北国史宁语》。
[82]《清高宗实录》卷301,乾隆十二年十月癸未。
[83]《平定两金川方略》卷69,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丁巳。
[85]《册府元龟》卷427,将帅部、受降。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58页。
[87]参见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四川省懋功直隶厅。
[88]《清高宗实录》卷1004,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丙辰。
[89]《清高宗实录》卷1004,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庚辰。
[90][92][93][111]《清高宗实录》1004,乾隆四十一年三月丙戌。
[91]《清高宗实录》卷1004,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辛巳。
[95][113][121][124]见曾唯一:《乾隆平定金川后的善后事宜》,《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
[96][98][125]《清高宗实录》卷1008;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壬申。

⑰《清高宗实录》卷 1007,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己巳。
⑲《清高宗实录》卷 1009,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庚寅。
⑩李心衡:《金川琐记》14。
⑩⑩⑩⑩⑩⑩⑪⑪⑪⑫《四川通志》卷 87,武备、屯练。
⑩《清宗高实录》卷 1053,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庚寅。
⑩《清史稿》卷 120,《食货志 1》。
⑪李心衡:《金川琐记》7。
⑪《清高宗实录》卷 1016,乾隆四十一年九月辛未。
⑪李心衡:《金川琐记》4。
⑪李心衡:《金川琐记》9。
⑫李心衡:《金川琐记》11。
⑫《清高宗实录》卷 1017,乾隆四十一年九月戊戌。
⑫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 15。
⑬《清史稿》卷 101,《乐》8。阿尔萨兰、大郭庄、四角鲁为舞蹈,得梨、柏且尔、得勒窝是乐器。
⑬《清高宗实录》卷 1104,乾隆四十五年三月辛丑。
⑬《列宁全集》第 22 卷第 107 页。

(作者李鸿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邮编 100872
白　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宣武区委员会　　邮编 100054)